

情绪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周婷, 王登峰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目的: 调查中国人对情绪表达抑制的使用情况并探索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方法: 采用问卷法收集 265 名被试对情绪表达抑制的使用及心理健康相关数据。结果: ①在较亲密关系中(父母、好友)的表达抑制显著少于较疏远关系中(老师或上级、一般同学或同事), 在上级情境(老师或上级)下的表达抑制显著多于平级情境(一般同学或同事); ②对负性情绪的表达抑制多于阳性情绪; ③父母、好友情境下的情绪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有一定相关, 老师或上级、一般同学或同事情境下的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相关不显著。结论: 情绪表达抑制与情境、情绪类型有关, 父母密友等情感性关系中的情绪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水平有关。

【关键词】 情绪表达抑制; 情境; 情绪类型; 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2)01-0065-04

Usage of Emotion Suppress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Mental Health

ZHOU Ting, WANG Deng-fe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how Chinese use emotion suppression as a regulatory strategy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emotion suppression and mental health. **Methods:** 265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report their habitual usage of emotion suppression and mental health related data. **Results:** ①The usage of emotion suppression was less frequently in close relationship (e.g., parents and close friends) than in distant relationship (e.g., teacher or supervisor, classmates or colleagues). Emotion suppression was more used in front of higher authorities (e.g., teachers or supervisors) than towards peers (e.g., classmates or colleagues); ②Suppression of negative emotions was used more frequently than positive emotions; ③Emotion suppression towards parents and close friends was related to mental health whereas the correlation of mental health and emotion suppression towards teachers or supervisors and classmates and colleagues was not significant. **Conclusion:** Usage of emotion suppression is related to context and emotion type. Emotion suppression in expressive tie (e.g., towards parents and close friends) is related to mental health.

【Key words】 Emotion suppression; Context; Emotion type; Mental health

情绪表达抑制(emotion suppression)是情绪调节方式的一种, 指在情绪体验产生之后对情绪表达进行有意识的抑制^[1]。实验研究表明, 相比于对照组, 使用情绪表达抑制的被试有更强的负性情感体验, 更大的心血管指标波动(cardiovascular reactivity)^[2-4]。研究表明, 习惯性使用情绪表达抑制者比非抑制者有着更多的负性情感体验、更差的人际关系以及更低的生活满意度^[5]。情绪表达抑制与心理病理的关系也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研究结果表明, 相比于认知重评, 使用表达抑制与低自尊、低生活满意度^[5]、高抑郁、高焦虑症状^[6]有关。与对情绪的接受相比, 表达抑制会诱发更强的负性情绪体验, 与焦虑症和心境障碍有关^[7]。情绪调节方式与心理病理关系的元分析表明, 在非临床样本和临床样本中都发现了情绪表达抑制和抑郁症状的相关, 而临床样本中的相关系数($r=0.68$)要大于在非临床样本调查中得到的相关系数(r 在 0.3, 0.4 左右), 并且这种相关的强度可能是临床症状严重性的函数^[8]。

然而, 情绪表达与文化密切相关, 不同文化下对情绪表达的社会意义有不同的理解, 从而形成不同的情绪表达规则, 并通过文化的强化作用影响个体的行为表现。中国文化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 以儒家关系主义为特点, 即根据人际关系性质的不同使用不同的交换原则, 并据之表现不同的外显行为^[9]。本文的第一个研究目的是关注情绪表达规则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情绪表达抑制在中国文化下的使用情况。

现有研究发现, 文化是情绪表达抑制后果的重要调节变量。人际互动中的情绪表达抑制对西方高加索人有生理方面的负性影响, 而情绪表达则与亚裔的生理负性反应有关^[10]。另外, 西方价值观强的人使用表达抑制造成的人际损害大, 而西方价值观弱的人使用表达抑制并不会对人际造成负性影响^[11], 说明不同文化价值观会影响个体对情绪表达抑制的理解, 西方价值观弱的人更不倾向于认为对方的表达抑制是对自身的漠视与回避。

目前国内对情绪表达抑制与人际适应及心理健康的研究尚未得到一致结论。一部分研究发现,使用情绪表达抑制会影响人际关系^[12]和主观幸福感^[13];然而,另一部分研究发现,使用情绪表达抑制与自我肯定、抑郁、焦虑^[14,15]、心理弹性^[16]没有相关性,并对主观幸福感没有预测作用^[17]。研究结果的矛盾可能与不同研究者使用的测量工具不同有关,但先前研究所使用的工具都没有区分情境因素,而是探讨个体使用情绪表达抑制的一般情况。鉴于中国人行为的关系主义特征,这样的研究方法很可能使各种情境效应互相抵消而无法看到中国人情绪表达抑制更为丰富的深层特点。本文的第二个目的,即在于揭示中国人在不同情境下使用情绪表达抑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中国文化属于高情境文化 (high context culture),情境因素对中国人的行为预测有重要作用^[18]。在高情境文化中,面子很重要,人们尽量避免直接对抗,不在公共场合表达不同意见和不满,以保持社会和谐和彼此间的密切关系^[19,20]。本文中的情境因素特指个体与不同关系类型的人的互动场合,选取母亲情境、父亲情境、好朋友情境、老师或上级情境以及一般同学或同事情境这五种比较典型的情绪表达情境。按照传统中国的“庶人伦理”,在人际交往的外显表现上要从亲疏和尊卑两个维度衡量彼此之间的角色关系。在人际互动中,首先要遵循“尊尊原则”,即决定谁是资源分配者,有权决定资源分配方式;再根据“亲亲原则”,根据彼此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决定资源分配和人际交往中的外显行为。

除了情境因素,本研究还关注不同情绪类型对情绪表达抑制的频率和结果的影响。不同情绪类型有着不同的社会意义:快乐等正性情绪传达的是愿望得以实现,愤怒等情绪则传达出没有得以实现的需要或愿望,而悲伤更可能传达出脆弱性^[21]。不同情绪的表达也会对外显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相比于快乐,对愤怒的表达对人际和谐有潜在的威胁。因此,不同情绪所传达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影响显然会影响是否抑制表达的决策。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265名被试参与本研究,其中本科生139人,硕士及博士研究生62人,社会从业人员49人(主要来自公务员、金融、医疗、教育、工程等领域),另有15人未注明职业。被试中男性125人,占47.2%,女性

134名,占50.6%,另有6人未注明性别。被试的年龄介于16岁到37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3.22(3.52)岁。

1.2 测量工具

1.2.1 情绪表达抑制使用情况调查问卷 对 Gross 等(2003)的情绪调节问卷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 的情绪表达抑制分量表进行改编,加入情绪表达抑制的5个表达情境,即在母亲、父亲、好朋友、老师或上级、一般同学或同事面前的情况,并考虑对快乐、愤怒和悲伤三种情绪类型的表达抑制(条目如,想想你和母亲在一起的情况。面对母亲时,你有多大可能会这样做:当我感到快乐时,我会控制自己不让它表露出来)。通过加入情境和情绪类别因素,将原有的4道题量表发展成为一个45道题的9点量表,每种情境下对一种特定情绪的表达抑制用3道题测量(原问卷中有2道题目干相似,其中1道题指向正性情绪,1道题指向负性情绪。在改编时由于加入了具体的情绪类型,只用了原问卷3道题的题干进行改编)。由于情绪类型和情境均为被试内变量,条目顺序的不同可能影响结果,本研究对情绪类型的顺序作一定平衡,从而生成情绪类型呈现顺序不同的6个问卷版本。该问卷每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在0.88-0.97之间。

1.2.2 罗森伯格自尊量表 共10个条目,为4点量表。量表总分用以表示被试的自尊水平,分数越高,自尊越低^[22]。

1.2.3 SCL-90 躯体化分量表 躯体化分量表共12个条目,为5点量表。统计分析时用总分计入,分数越高表示躯体症状越多、越严重^[22]。

1.2.4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共20个条目,为4点量表。分数越高,抑郁症状越明显^[22]。

1.2.5 生活满意度量表 共5个条目,为7点量表,分数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

1.3 程序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向被试随机发放6个版本问卷的其中一个,回收率为100%。使用 SPSS 17.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不同情境下三种情绪类型表达抑制使用情况

被试在不同情境下对三种情绪的表达抑制得分见表1。以情境、情绪类型为组内变量,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来比较在不同情境下对三种情绪类型使用表达抑制的不同。结果显示,情境主效应显著, $F(3.06, 805.00)=147.37, P<0.001, \eta^2=0.36$;情绪类型主

效应显著, $F(1.66, 437.51)=288.63, P<0.001, \eta^2=0.52$; 情境与情绪类型的交互作用也显著, $F(6.66, 1750.68)=5.38, P<0.001, \eta^2=0.020$ 。

对于情境主效应, 进一步的 Bonferroni 分析发现, 母亲情境下的情绪表达抑制小于父亲情境 (mean difference=-0.44)、老师和上级情境 (mean difference=-2.24) 以及一般同学或同事情境 (mean difference=-1.70), $P_s<0.001$ 。父亲情境下的表达抑制显著大于母亲情境, 但显著小于老师或上级情境 (mean difference=-1.80, $P<0.001$) 以及一般同学或同事情境 (mean difference=-1.26, $P<0.001$)。好朋友情境下的情绪表达抑制显著小于老师或上级情境下的表达抑制 (mean difference=-2.07, $P<0.001$) 以及一般同学或同事情境下的表达抑制 (mean difference=-1.53, $P<0.001$)。老师或上级情境下的表达抑制不仅显著高于母亲情境、父亲情境和好朋友情境, 还显著高于一般同学或同事情境 (mean difference=0.55, $P<0.001$)。

对于情绪类型主效应, Bonferroni 检验发现, 对快乐的表达抑制显著少于对愤怒 (mean difference=-2.09, $P<0.001$) 和悲伤 (mean difference=-2.20, $P<0.001$), 而对愤怒和悲伤的表达抑制得分无显著差

异 (mean difference=-0.11, $P=0.482$)。

由于情境 * 情绪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进一步作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 情境 * 情绪类型的交互作用体现在, 在父亲情境和好朋友情境下对愤怒和悲伤的表达抑制模式不同。对于愤怒情绪, 父亲情境下的表达抑制与好朋友情境无显著差异 (mean difference=0.033, $P=0.176$); 而对于悲伤情绪, 父亲情境下的表达抑制显著高于好朋友情境 (mean difference=0.69, $P<0.001$)。

2.2 情绪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变量的相关分析

对不同情境下对快乐、愤怒和悲伤三种情绪的表达抑制得分与自尊、抑郁症状、躯体化症状及生活满意度水平作简单相关, 结果详见表 2。

表 1 不同情境下对三种情绪的表达抑制得分

	情 绪		
	快乐	愤怒	悲伤
母亲	2.70 (1.90)	4.89 (2.30)	5.21 (2.38)
父亲	3.09 (2.07)	5.23 (2.26)	5.70 (2.25)
好朋友	3.00 (2.08)	5.20 (2.37)	5.02 (2.31)
老师或上级	5.18 (2.30)	7.25 (1.75)	6.99 (1.74)
一般同学或同事	4.59 (2.25)	6.54 (1.87)	6.65 (1.92)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

表 2 不同情境下对快乐、愤怒和悲伤的表达抑制与自尊、抑郁、躯体化症状及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 (N=264)

	M	SD	MH	MA	MS	FH	FA	FS	FrH	FrA	FrS	SH	SA	SS	CH	CA	CS
自尊	18.23	5.47	0.084	-0.13*	-0.054	0.13*	-0.057	0.025	0.17**	0.031	0.008	0.011	-0.15*	-0.012	0.078	0.005	0.038
抑郁症状	34.27	10.23	0.11	-0.14*	-0.040	0.16*	-0.080	0.053	0.20**	-0.011	-0.037	0.063	-0.087	-0.006	0.12	-0.012	0.044
躯体化症状	5.72	6.13	0.16*	-0.003	0.021	0.14*	-0.047	0.011	0.14*	-0.053	0.019	-0.053	-0.061	-0.058	0.021	-0.044	-0.034
生活满意度	19.18	6.42	-0.069	0.036	-0.091	-0.11	0.055	-0.061	0.002	0.061	0.11	0.001	0.050	0.021	0.033	0.11	0.032

注: M=母亲, F=父亲, Fr=好朋友, S=上级或老师, C=一般同学或同事; H=快乐, A=愤怒, S=悲伤; 两个字母的组合表示不同情境下的不同情绪, 如 MH 表示母亲情境下的快乐情绪。余类推。* $P<0.05$, ** $P<0.01$ 。

3 讨 论

3.1 情绪表达抑制与表达情境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 人际关系的亲疏尊卑会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较亲密关系中 (父母、好友) 的表达抑制显著少于较疏远关系中 (老师或上级、一般同学或同事), 在上级情境 (老师或上级) 下的表达抑制显著多于平级情境 (一般同学或同事)。按费孝通差序格局的说法, 中国人的社会网络是“以自己为中心, 像水的波纹一般, 一圈圈推出去, 愈推愈远, 也愈推愈平”。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这波纹间的差序^[23]。在这样的差序格局下, 中国人的自我也不同于西方人的独立自我, 而是一种关系自我, 会依据个人与互动对象关系的不同, 对自己做出不同的界定^[24]。黄光国在“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中, 根据关系中情感性成分和工具性成分的多少, 将中国

人的人际关系分为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和介于二者之间的混合性关系。母亲、父亲和好朋友属于情感性关系的范畴^[24]。情感性关系遵循需求原则, 家庭和密友会为个体提供生活所需的物质和精神资源, 而情绪则是表达需求的重要途径。从而可以理解中国人在情感性关系中能够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对老师或上级、一般同学或同事则偏向于工具性关系或混合性关系 (本文统称为一般关系, 与情感性关系相对)。工具性关系遵循的法则是公平法则, 这是一种普遍性而非个人化的法则。由于工具性关系中的情感成分很少, 个体往往根据客观的标准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决策^[24]。因此, 在这类关系中, 中国人则更加收敛情绪的表达, 选择理智的应对。中国人对父亲比对母亲有更多的表达抑制, 与父母在养育中的分工不同及家庭权力地位有关。父亲是一家之主,

是家庭一切事务的决定者,处于权力的最高端;而“母,牧也”,母亲是孩子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料者^[25]。由此,父子关系尊卑维度上高于母子关系,子女对父亲则多了敬畏之情,情绪表达上更加收敛。个体对权威或上级更注意抑制情绪的表达,尤其是负性情绪。这往往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理智决定,可以通过对工具性关系的处理原则进行理解。

3.2 情绪表达抑制与情绪类型的关系

研究结果还显示,对快乐的表达抑制显著少于愤怒和悲伤。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特点被称为社会趋向(social orientation),以和谐为最突出特征,人们通过顺从、合作、全身心融入环境的方式来达成这种和谐^[26],鼓励人际和谐和反对冲突是解决问题的原则之一。而对愤怒的表达是攻击性的体现,对人际关系有潜在的破坏作用。因此,对愤怒的表达抑制是被文化所提倡的,从而得到文化的强化。对悲伤的表达,则传达出个体的脆弱性,更为个人性,对表达情境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在多数情境中,个体使用表达抑制来处理悲伤的可能性都较高。

另外,本研究还发现对愤怒的表达抑制在父亲情境和好友情境中无差异而在父亲情境下对悲伤的表达抑制高于好友情境。原因可能在于,父亲形象一定程度上代表权威,难以满足表达悲伤后被安慰的需要,而亲密友谊则能够更好地满足这一需要。

3.3 情绪表达抑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本研究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情感性关系(父母及好朋友)中对情绪的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有关,而一般关系(老师或上级、一般同学或同事)中对情绪的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相关性不显著。其中,情感性关系中对快乐的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的影响最为明显,其次为对愤怒的表达抑制,对悲伤表达抑制的影响则不显著。原因可能是文化里对快乐表达的允许度大,对快乐表达的过度抑制反映了个体对情绪的不接纳和回避,从而与个体的心理健康相关联;而对愤怒和悲伤的适度抑制则是个体社会化成功的标志,不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有趣的是,在情感性关系中对快乐的表达抑制与对愤怒的表达抑制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呈现截然不同的影响,在父母和好朋友面前对快乐的高表达抑制与低自尊和高抑郁相联系,而在母亲面前对愤怒的高表达抑制则与高自尊和低抑郁相联系。原因可能是在母亲面前对愤怒的表达抑制反映了个体在情感性关系中能够成功回避直接冲突,从而维持情感性关系的和谐并从和谐的情感性关系中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继而促进自身心理健康。该结果尚需要实证研究的进一步确认。

现有跨文化研究比较西方人和华人使用表达抑制的影响,提示华人在实验室情境下使用表达抑制不会对人际关系和生理健康造成负性影响^[10,27]。本研究结果与这一结论不一致。先前的国内外研究均未细分被试在不同情境下对表达抑制的使用,而只是笼统提问被试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倾向性,无法发现被试在不同情境下对表达抑制的使用及其影响。跨文化研究的实验室研究中,往往也只涉及被试与陌生人(通常是另一陌生被试或实验助手)互动中的情绪调节,只研究单一情境下的情绪调节反应^[27,28]。而从本研究结果看,以往跨文化研究中发现的文化的调节作用,可能只在一般关系通路中成立。因此,本研究结果提示,研究中国人使用情绪表达抑制的影响,应当区分情感性关系和一般关系两条通路。中国人在情感性关系中对情绪的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有关,而在一般关系中对情绪的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无关。

参 考 文 献

- 1 Gross JJ, Levenson RW. Hiding feelings: The acute effects of inhibiting negative and positive emo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997,106(1): 95-103
- 2 Gross JJ, Levenson RW. Emotion suppression: Physiology, self-report and expressive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3, 64: 970-986
- 3 Gross JJ, John OP. Revealing feelings: Facets of emotional expressivity in self-reports, peer ratings, and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72(2): 435
- 4 Mauss IB, Gross JJ. Emotion suppression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Nyklicek I, Temoshok L, Vingerhoets A.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Health: Brunner-Routledge*, 2004. 62-81
- 5 Gross JJ, John OP.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 Implications for affect,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5(2): 348-362
- 6 Moore SA, Zoellner LA, Mollenholt N. Are expressive suppression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associated with stress-related symptom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08, 46: 993-1000
- 7 Campbell-Sills L, Barlow DH, Brown TA, Hofmann SG. Acceptability and suppression of negative emotion in anxiety and mood disorders. *Emotion*, 2006, 6(4): 587-595

Joff 等人指出,应对是个体对现实环境变化有意识、有目的的和灵活的调节行为^[10],Martin 指出应对的主要功能是调节应激事件作用,包括改变对应激事件的评估,调节与事件有关的躯体或情感反应。个体的应对方式与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密切。本研究中发现应对方式中积极应对方式没有进入影响因素模型,预示着积极应对方式对心理应激的作用不显著,该结论与国内先前研究相符^[9]。研究发现应对方式中的消极应对方式在心理健康因素模型中中介效应显著,患者家属在应对家庭成员罹患精神分裂症这一应激性生活事件时,消极的应对表现在多采取逃避、自责、幻想以及发泄等不成熟型方式,不但不能使得问题得到积极解决反而导致出现各种心理问题。(致谢:感谢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戴晓阳教授、深圳市精神卫生研究所高北陵教授、胡赤怡教授、刘铁榜教授对本研究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参 考 文 献

- 1 沈渔邨主编. 精神病学(第四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393-394
- 2 于文军,胡纪泽,习萍,等. 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心理健康研究 II: 照顾负担影响因素.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19(4): 518-520
- 3 Bulger MW. Burdens and gratifications of caregiving: Appraisal of parental care of adults with schizophrenia.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1993, 63: 255-265
- 4 Wai-Tong Chien. The perceived burden among Chinese family caregivers of people with schizophrenia.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007, 6(16): 1151-1161
- 5 Lowyck B, De Hert D, Peeters E, et al. A study of the family burden of 150 family members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 *European Psychiatry*, 2004, 19: 395-401
- 6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等.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增刊.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9. 31-35; 127-131; 149-152; 122-124
- 7 龚耀先. 艾森克个性问卷在我国的修订. 心理科学, 1984, 4:
- 8 Chien WT, Norman I.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family burden interview schedule. *Nursing Research*, 2004, 53: 314-322
- 9 姜乾金,黄丽,卢抗生,等. 心理应激:应对的分类与心理健康.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3, 12(1): 145-147
- 10 Joff PE, Bast BA. Coping and defense in relation to accommodation among a sample of blindman. *J Never Ment Dis*, 1978, 166: 537-552
- 8 Aldao A, Nolen-Hoeksema S, Schweizer S. Emotion-regulation strategies across psychopathology: A meta-analytic review.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10, 30: 217-237
- 9 Hwang KK. Chinese relationalism: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2000, 30(2): 155-178
- 10 Butler EA, Lee TL, Gross JJ. Does expressing your emotions raise or lower your blood pressur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09, 40(3): 510-517
- 11 Butler EA, Lee TL, Gross JJ. Emotion regulation and culture: Are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emotion suppression culture-specific? *Emotion*, 2007, 7(1): 30-48
- 12 李梅,卢家楣. 不同人际关系群体情绪调节方式的比较. 心理学报, 2005, 37(4): 517-523
- 13 王春花. 大学生情绪调节方式与生活满意度研究. 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 2007
- 14 魏义梅,付桂芳. 大学生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7, 15(2):
- 15 段小池. 生活事件、情绪调节方式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长春: 吉林大学, 2007
- 16 张佳佳,李敏,彭李,韩爱华,廖文君. 大学生心理弹性与人格特点、情绪调节方式及中性情绪面孔知觉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19(3): 347-349
- 17 王力,张厚粲,李中权,柳恒超. 成人依恋、情绪调节与主观幸福感: 重新评价和表达抑制的中介作用. 心理学探新, 2007, 3: 91-96
- 18 Wang DF, Cui H. Relations with personality and cross-situational consistency of behavior. *Sinica Acta Psychologica*, 2006, 38(4): 543-552
- 19 Kim D, Pan Y, Park HS. High-versus low-context culture: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Korean, and American cultures. *Psychology and Marketing*, 1998, 15(6): 507-521
- 20 Hall ET. *Beyond culture*. New York: Anchor Press-Double-day, 1976
- 21 Clark MS, Finkel EJ. Willingness to express emotion: The impact of relationship type, communal orientation, and their interactio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05, 12: 169-180
- 22 汪向东.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3
- 23 费孝通. 乡土中国.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24 黄光国,胡光缙. 人情与面子: 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25 陈竞芳. 家庭教育中的父母角色定位探究.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8, 2: 93
- 26 Yang KS. Chinese social orientation: An integrated analysis In: Tsung-Yi Lin W-ST, Eng-Kung Yeh. Chinese societies and mental heal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9-39
- 27 Butler EA, Lee TL, Gross JJ. Emotion regulation and culture: Are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emotion suppression culture-specific? *Emotion*, 2007, 7(1): 30-48
- 28 Suchday S, Larkin KT. Psychophysiological responses to anger provocation among Asian Indian and White 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2004, 11(2): 71-80

(收稿日期:2011-05-25)

(收稿日期:2011-08-29)

(上接第 68 页)